

译艺谱美曲，译论写华章

——百岁翻译家许渊冲教授访谈录

余承法¹ 李亚舒² 许渊冲³

(1.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中国科学院 国际合作局, 北京 100864;
3.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许渊冲教授在访谈中回忆了自己的翻译人生和翻译艺术,强调了翻译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源流和内涵,并展望了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和翻译人才培养的前景。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①文学翻译者需要夯实内功,从学习、模仿、借鉴中体悟翻译艺术之美;②翻译实践先于并高于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应该来源并运用于翻译实践,同时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③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可进一步概括为“美化之(艺术)”,即“三美”本体论、“三化”方法论、“三之”目的论,这是源于实践经验总结、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受益于先哲前贤的学术思想;④典籍外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中国文化梦需要几代人接力完成,外译理论和实践人才应该尽早培养,形成梯队,以便又好又多地为世界传达中华文化之美。

关键词:许渊冲教授;文学翻译;译艺;译论;美化之艺术

Composing Beautiful Songs Through Translation Art and Writing Brilliant Chapters with Translation Thought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Xu Yuanchong

YU Chengfa LI Yashu XU Yuanchong

Abstract: In the interview, Prof. Xu Yuanchong recalled his life as a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外‘钱学’文献系统整理、研究与开发”(19AWW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承法,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翻译学和翻译传播学研究。

李亚舒,男,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副会长,资深翻译家,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许渊冲,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scholar, emphasized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reinterpreted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his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osed his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foreign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ivation of capable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His major viewpoin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①Literary translators shoul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ranslation art and gain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beauty of translation by reading, comparing and imitating others' fine versions; ②Translation practice precedes and outweighs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the latter derived from and applied to the former and at once serving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③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ory of the Chinese school, including triple beauty as ontology, triple transformation as methodology and triple ability as teleology, is originated from translation practice, roo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sages' academic thoughts; ④Foreign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s an arduous long-term project requir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so it is urgent to cultivate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as to disseminate the beautiful Chinese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better and faster.

Key words: Prof. Xu Yuanchong;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rt; translation theory; art of beauty; transformation and ability

[访谈者按语]许渊冲(1921.4.18—2021.6.17),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从事翻译工作80余年,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出版中、英、法著作和译作160余部,发表文章160多篇。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国际译联“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2015年被评为“中华之光”年度人物。2020年7月4日,许老在家中欣然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回答了有关翻译艺术、翻译实践、翻译思想、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

余承法、李亚舒(以下简称“余、李”):许老,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热烈祝贺您的新著《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于年初出版!这是您百岁生日最有价值的献礼。您在1939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回望您的百年人生路,您最成功的选择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许渊冲(以下简称“许”):我这辈子最成功的选择就是结外语缘、做翻译梦。我自幼就喜欢历史故事和诗词歌赋,喜欢美的、不同寻常的事物。表叔熊式一的翻译成就彻底改变了我对英语学习的态度,并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初中时喜欢中国文学,后来背诵了很多英语名篇,这些为我的外语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我高中时喜爱鲁迅的杂文,相信他主张的“直译”。大学期间诸多良师益友对我的翻译和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吴宓、钱锺书两位先生在课堂上的理论讲解和译例分

析,让我豁然开朗。钱先生更是我的翻译恩师,多次跟我通信,交流文学翻译心得。抗战期间,我报名参军并担任翻译,在欢迎美国“飞虎队”的招待会上,将“三民主义”脱口译成“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第一次感受到沟通中西文化的喜悦,于是将外语学习的重心转向翻译。

我此生无憾!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译作都是精华,也有平庸之作甚至糟粕。精华受到前人启发,可以传给后人,糟粕则需要大家批评和超越。我一直在努力超越自己,追求翻译艺术之妙,传播中华文化之美。

余、李:您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译著是什么?您能谈谈相关情况吗?

许:我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译著是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切为了爱情》,译自英国17世纪“桂冠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的经典剧作*All for Love*。1951年,我从法国留学归来时,被分配到北外法文系任教。我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经过据理力争和停职反省,最后得到宽大处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膨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了不荒废自己的英语能力,并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这个小剧本。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我被批判为思想“右倾”,译著也跟着受批。1994年,漓江出版社再版时,我将书名改为《埃及艳后》。将“all for love”直译为“一切为了爱情”也是可以的,但不够文气。书名副标题“the world well lost”的字面意思是“这个世界损失得很好”。若将“world”译成“世界”,则显得太重,而“江山”既指代国家,又有人情味、书卷气。将“lost”直译为“失去、丢失、牺牲”,都不可取,显得俗气。我后来意识到“殉”字能准确表达“为爱情而弃江山”的含义,容易让中国读者联想到“爱江山更爱美人”。因此,改译名《江山殉情》既能兼顾主副标题的含义,又能概述剧中安东尼(Antony)和克利奥佩屈拉(Cleopatra)的殉情故事,既富有韵味和余味,又体现文化品位。我由此感到:美的事物需要不断发现,妙的文字需要仔细体悟,翻译艺术永无止境。

余、李:您在2017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期《朗读者》中接受董卿采访时说道“如果我活到100岁,我计划把莎士比亚翻译完。”您也希望有人继续翻译莎士比亚并能超越您。请问您现在的翻译进展如何?您觉得何人具备何种素养才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许:我目前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的一半。我每天都在坚持,但进度不快,无法实现百岁译完莎士比亚的梦想。我认为你们这些人,包括你们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都可以接上这根翻译“棒”。年轻人有时间和精力,加上现在设备先进、资源丰富,应该比我们这代人翻译得更快、更好。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要坐得住冷板凳。翻译莎士比亚需要掌握扎实的中英文功底,全面了解英国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尤其需要了解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背景,准确分析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查阅词典、上网搜索、机器翻译并非解决翻译问题的万能钥匙。总之,翻译莎士比亚需要有足够的精力、功力、智力和毅力。

平心而论,我翻译的莎士比亚有一个从不好到好、再到更好的过程,关键是要不停地理解和思考原文,不断地追求美妙的译文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提到的《一切为了爱情》和《江山殉情》,通过比较可以辨识高下。翻译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人生如果只有美好,“美”就不那么“好”了。他人的作品在进步,我的翻译在慢慢进步,我们的人生也在慢慢进步,于是才有“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的佳句。

余、李:提到翻译艺术,我们惊叹于您的译果累累,受益于您的理论洞见。您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一直是双轨驱动、相得益彰。您在参与《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组织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中,认为“实践第一,理论第二”(许渊冲,2003),是否意味着“翻译实践高于翻译理论”?您现在如何重新认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您自己是如何处理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的?

许: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仍然坚持“实践第一,理论第二”,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在时间上,先有实践,后有理论,理论是对实践的经验思考和理性提升;第二,在重要性上,实践高于理论,“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理论要服从实践”(许渊冲,2003);第三,翻译理论应该是双向的,来源并适用于翻译实践。一个人没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不可能提出解决中外互译问题的理论。我翻译实践的数量和影响远远超过翻译论著。我的翻译之路是:实践—理论—再实践—完善理论—回到实践。具体说来,先领会原文之美,再创造译文之美,通过比较译文和原文,产生译感之美,悟出道理,将经验和体会上升为翻译理论,再用理论来检验翻译实践,在思考中借鉴他人理论,在实践中完善我的翻译理论,再次回到实践加以检验。我1956年公开发表译作,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表论文,而且大多是反思和研究我和他人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包括讨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等。经过较长时间的成果积累和经验总结,我开始思考“译文能否胜过原文”“如何发挥译文优势”等问题。我曾在《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一文中借助毛泽东诗词翻译的不同版本,解释严复的“信、达、雅”,借助已有的翻译经验重新审视“形似”“意似”“神似”(许渊冲,1984)。我一直坚持实践先于理论,在实践中积累、反思,为我的经典名著翻译撰写了一些前言后语,逐渐形成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当然,理论思考不能止步于翻译实践,尤其是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方面,翻译理论还必须从哲学、文论、美学等学科中汲取养分,追求翻译理论的逻辑性、体系性、自洽性以及翻译现实的关怀。

余、李:您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对于其中每个字的来源和界定,您给出了不同解释。“三美”“创造美”是本体论,“三化”“发挥优势”是方法论,“三之”“神似”是目的论,“艺术”“竞赛”是认识论;“信”是翻译的本体论,“达”是方法论,“雅/优”是目的论(许渊冲,1999);中国学派的译论来源于老子的“本体论”和孔子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许渊冲,2012)。令人困惑的是:同一个翻译理论中怎么会多种来源和解释?它们

之间存在什么关联? 您现在对这十字译论有新的解释吗?

许: 我在不同场合对这十个字有不同表述, 表明我对翻译艺术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 这也是立足中国文化传统、总结前人理论提出来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现在认为“美化之艺术”更重要, “创优似竞赛”内涵也包括在其中, 因此我的翻译理论可进一步简化为“美化之”, 这基本概括了我提出的翻译本体论、方法论和目的论。

“美”作为文学翻译的本体论, 借自鲁迅“诵习一字, 当识形音义三: 口诵耳闻其音, 目察其形, 心通其义, 三识并用, 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 意美以感心, 一也; 音美以感耳, 二也; 形美以感目, 三也。”(鲁迅, 2018: 5-6) 这启发我提出文学翻译的“三美论”: 意美、音美和形美。我已有一些阐述, 这里就不再赘述。但要强调一点, 作为本体论的“三美”包含“三似”, 这是我对孔子“从心所欲, 不逾矩”(杨伯峻, 1980: 13) 的理解和挪用, 也是总结朱光潜和钱锺书的观点, “‘从心所欲, 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朱光潜, 2014: 156; “盖艺之至者,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钱锺书, 2001: 197)。我将其运用于文学翻译, 形成了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的依据“从心所欲”是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自由选择最好的译文表达方式, 追求“美”的自由王国, 着眼于积极方面“不逾矩”指不违反翻译的客观规律, 坚持“似”的原则, 停留在艺术的必然王国, 强调消极方面。译者要在“不逾矩”、不违背“求似”规律的前提下, 尽量传达原文的“美”。“似”体现译文跟原文的关系, 包括低级的“形似”、中级的“意似”、高级的“神似”; “美”表面看是指创造的译文之美, 实则蕴含原文之美, 分为意义之美、声音之美、形式之美, 在翻译中的优先序列是依次递减。文学翻译虽然创造美, 但我不主张牺牲原文内容, 也不过分强调译文形式。原语和译语的表达方式并非完全相同, 但传达的内容应该基本相同, 至少需要做到“意似”、追求“意美”。“三美论”作为文学翻译的本体论, 是将原语之美转化为译语之美, 解决形似和神似的矛盾, 亦即直译和意译的矛盾。总之, 我基于鲁迅的“三美”, 根据朱光潜和钱锺书解读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提出了“三美、三似补论”, 或曰“新本体论”。

“美”需要借助具体手段、运用恰当方法加以实现, 此为“三化”方法论。“化”源于钱锺书的“化境说”: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学习惯的差异而漏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锺书, 2002: 77) 他站在原语和译语的角度, 提出了“欧化”和“汉化”, 我进一步提出了“三化”: 浅化、等化和深化。译文首先需要做到跟原文“等化”, 如不“等化”, 则会更优或更劣, 不得已采取“浅化”, 能做到“深化”当然是求之不得。如:

原文: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译文 A: Three blacksmiths equal Solomon.

译文 B: Three cobblers equal Zhuge Liang.

译文 C: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mind.

译文 A 将中国读者熟知的“臭皮匠”和“诸葛亮”分别换成“blacksmiths”和“Solomon”，这是在力图扭转英语劣势，以方便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却失去了汉语的特有意象，译文比原文差一点、隔一层，属于“浅化”；译文 B 保留了原文意象，采用“等化”争取译文跟原文的均势，却可能让英语读者不知所云、不明深意；译文 C 增加了背景信息“with their wits combined”和“the mastermind”，还形成了韵律和节奏，这是充分发挥译语优势采取的“深化”。我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基于钱先生的“化境”，将“化”明确为可操作的三级，认为“三化”应该力求“优化”。如果译文不仅似于原文，而且胜过原文，效果就会优于原文，跟原文“竞赛”，可谓“以创补失”。此为我的“三化补论”，或曰“新方法论”。

“之”来自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第十二章）。文学翻译至少需要让人“知之”，即译文忠实得使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进而令人“好之”，即译文通顺得使读者喜欢“说什么”，如使人“乐之”，即译文精彩得使读者对“说什么”和“怎么说”感到愉快，则进入最高境界。此为文学翻译目的论。将“三之”“三化”结合起来，即“浅化”是扭转译语劣势，可以使人“知之”，如上例中让英美人知道中国有类似“三个铁匠的智慧等于所罗门”的说法。“等化”是争取译文跟原文的均势，可以使人“好之”，如例中增添英语中没有的“臭皮匠”“诸葛亮”，让英美读者喜欢这种说法。“深化”是发挥译文优势，可以使人“乐之”，如例中再增添对“臭皮匠”和“诸葛亮”的相关解释，使英美读者乐于接受该新奇说法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这是我总结孔子言论提出的“三之论”，即文学翻译目的论。

余、李：您多次深情回忆恩师钱锺书先生对您翻译人生的影响，谈及他赞赏您的诗歌翻译。您如何继承并超越他的译论和译艺？

许：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终生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才智过人，妙语惊人，嘉勉后人。“才智过人”的经典例子是他对成语“吃一堑，长一智”的翻译“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音形义三美具备，真了不起！当时，金岳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译文，就去问钱先生，没想到钱先生脱口而出，折服了当场所有人。钱先生的这种博学睿智，跟他深厚的家学渊源、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勤奋的读书笔记、不停的思考和领悟是分不开的。他除了急中生智、幽默风趣，还经常妙语如珠，真的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例如，他在课堂上讲到“skepticism”（怀疑主义）时，用简洁的英语解释“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 stop”（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将人分为三种类型“笑的”“愁的”“怒的”。钱先生就属于第一种，他经常原谅学生，主张“to understand all is to

pardon all”(理解就是谅解),不断勉励后学,对我而言,他是“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20世纪70年代,我拜读了钱先生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不太满意这种无韵译文,进行了重译,并请他斧正。他在给我的回信中称赞我的译文“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许渊冲,2017a)。他总体上认为“诗是不可译的”,但他对我译诗的肯定增添了我“以诗译诗”的信心,引导我理性思考如何才能既不得罪“诗”又不得罪“译”。20世纪80年代,我几次寄去新译请他指正,都收到了他的鼓励和赞誉。他评价我翻译的《苏东坡诗词》是“壮举盛事”,《唐诗一百五十首》《翻译的艺术》“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征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空谈理论与盲目实践,皆当废然自失矣”(许渊冲,2017a)。他阐述的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激发我深思,鼓励我继续从事翻译实践和研究。我在翻译唐诗宋词时,遇到疑惑就向他求教,他总是一语中的,让我茅塞顿开,既肯定我的妙译,也指出不足,如他认为我翻译的“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不忠的美人”。我很满意自己用 lovesick 和 silk 来处理“丝”这个字的双关义。学生在老师面前不能过于谦虚,要有自信,要有敢于挑战的决心和勇气,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钱先生对我的《李白诗选》英译本和《唐宋词选一百首》法译本比较满意,开玩笑说“太白能通夷语……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并戏称为“译才”“有双枪将、左右开弓手矣”(许渊冲,2017a)。这些溢美之词对我是勉励,也是鞭策,坚定了我走文学翻译之路的决心和信心。

余、李:您近年来发表的多篇论文紧随时代脉搏或针对译学热门话题,如:您论述“文学翻译对实现中国文化梦的重要性”(许渊冲,2014);您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六性”,在论述翻译的矛盾论时认为“航行自由≠横行霸道”(许渊冲,2016);您通过具体的译例对比和有理有据的分析,批驳“中国经典外译只能靠汉学家”之类的说法(许渊冲,2017b)。请问您在90岁高龄如何做到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许:我其实刚才也提到过,翻译研究来源于并服务于翻译实践,既要学习继承先哲前贤的学术思想,又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翻译理论才有实际用处,才有针对性、时代感和生命力。我人老心不老,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天花大约一个小时读报纸、看电视或听收音机,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内外大事,尽可能跟上翻译界新动态。例如,有人在翻译“道可道,非常道”时,把“道”音译为“Tao/Dao”,但外国人无法“知之”,更不能“好之”“乐之”,而译成“truth”就易于理解。这句话也可用来解决当今世界的大问题。个别西方大国一直批评中国不民主,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国政府的不作为、不民主。但现实是中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基本上控制了疫情,而美国感染和死亡的人数居全球前列。试问它是如何在为人民服务?美国前总统林肯早就说过,民主政府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政府。“of the people”(民有),说明民主的性质,这是本体论,中国跟美国的国体不同,中国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by the people”(民治),说明民主的方式,这是方法论,由人民来治理国家,涉及选举制度和方式,中国有适合自己的国情和做法。“for the people”(民享),说明民主的宗旨,这是目的论,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目的与方法之间,目的更重要,因为目的决定方法和手段。中国政府努力控制疫情、为人民治病,结果感染和死亡人数很少;西方某国政府不考虑为老百姓治病,而放任病情扩散,并且为了赢得选举,不惜一切代价转移国内矛盾并攻击中国。西方标榜得再多、再好也没有用,不仅要看现象,还要看结果、看本质。这时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批驳美国政府的错误言行,价值就非同一般。因此,翻译实践要关注现实,翻译研究要懂得实际需求;不然译文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研究成果会落后于时代。

余、李:您刚才谈到的《道德经》翻译涉及中国典籍的外译传播问题。有人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好译介模式是“中西合璧”,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您一直赞同徐志摩的观点“中国诗只有中国人才能译好。”(许渊冲,2020-12-31)像您那样精通中外语言、能做好典籍外译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西方人一直不主张将母语译成外语,所以中国人的翻译作品在国外不受待见。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中华文化应该怎样快速有效地走出去?

许:首先,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典籍作品不一定胜过中国人,有时根本不如中国人!他们翻译的唐诗、宋词、毛诗,不是理解错误,就是表达不准,传达不出原文之美。例如,毛泽东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美国文学教授兼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译成“(Daughters of China with a marvelous will,) you prefer hardy uniforms to colorful silk.”(Mao, 1972b: 97)。原诗中,“武装”是诗人赞美女民兵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乐观精神,富有意美。“爱”和“不爱”有正反的意美、重复的音美、错落的形美。“红装”“武装”还有对仗的形美。这三种“美”在译文中消失殆尽,而且第三人称改成了第二人称,回翻成汉语就是“你们喜欢耐穿的制服胜过彩色的丝绸”,根本没有传达原诗中赞美的意义和口吻,只剩下干瘪瘪的陈述。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Hua-ling Nieh)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恩格尔(Paul Engle)的“中西合璧”译文是“they like uniforms, not gay dresses”(Mao, 1972a: 82)。回翻成汉语是“她们喜欢制服,不喜欢花哨的衣服”。这是典型的形式对等,没有意美和音美,更难以传达诗人对女民兵的欣赏。我译成“they lov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她们爱面对硝烟,不爱涂脂抹粉),巧妙运用“face”和“powder”的双关义,通过换位形成一种俏皮的“回文”,兼具意美、音美和形美,远远胜过以上两个外国译文,也好于钱先生等人的集体译文“they love their battle array, not silks and satins”(Mao, 1976: 38),更是超越了原文。这个“超越原文”的大胆译法,在当时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批评。抚今追昔,通过比较,我坚信

自己的译文还是略胜一筹,这是我长期积淀、不断思考的结果。

西方人认为,译者应该始终将外语译成自己的母语,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这反映了他们的欧美中心主义和语言文化霸权主义,就像美国派飞机、军舰来南海就是“自由航行”,而我国的填海固岛工程就是“军事威胁”。部分中国人认为,只能靠汉学家从事中华文化典籍外译。这是盲目跟风、不自信的表现。大量的中译外实践表明,中国人采用优化译法创造的译作,不仅能够传达原文意义,还能基于原文创造意义,不仅能够达意,还能传情。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完全经得起考验,我们有文化自信的同时,还得练好中国语言文化的内功,读懂、吃透祖辈传承下来的经典,学习、模仿、借鉴我们已有的佳译精品,再将我们形成的翻译理论用来指导翻译实践。我在钱先生成绩的基础上前进,也希望大家在我的基础上再前进,就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将中华典籍一本一本地往外翻,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余、李:2016年,山西大同大学成立了“许渊冲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院”,以学术至尚、艺术至臻的理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建立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民间学术团体,确立如下目标:研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思想,分享先生的丰富成果;提供创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和交流平台;培养和指导优秀的翻译人才。四年来,研究院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活动。您对研究院的运行满意吗?您还有什么期许?

许:一些翻译同仁当初成立研究院时,我和夫人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创作和翻译更多优秀的作品,为翻译事业培养更多合格的人才。研究院围绕办院宗旨和目标,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成功举办了三届“许渊冲翻译大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踊跃参加。我对此非常满意,也希望研究院越办越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认为,除了在大学生中间开展翻译大赛之外,还可以让典籍外译走进大学课堂,让更多的年轻人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他们从事文化典籍外译的兴趣,让他们对中华文化及其典籍外译从“知之”到“好之”再到“乐之”。同时,也可以从中小抓起,培养他们从小阅读双语诗词的习惯,让全社会意识到文学翻译对实现中国文化梦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继承前人的翻译理论,更要敢于突破和创新,这样才能培养更多优秀的中华文化外译实践和研究人才,为辉煌灿烂的世界文化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余、李:您历经坎坷,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白寿之年仍笔耕不辍,一直都在为挺起中国文化的脊梁而不懈努力,努力实现“把一个国家的美变成世界的美”的理想。您投身翻译事业的家国情怀、执着信念,以及为推动文学翻译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激励学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用一首小诗表达对您的崇高敬意“风范耀千秋,译艺传万代。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再次

祝您健康长寿、喜乐平安!

许:谢谢《英语研究》编辑部!谢谢你们!祝你们再结学术硕果!

(本访谈系作者2020年7月4日在许老北大家中采访实录。以此纪念许老先生。)

参考文献

- [1] Mao, Tse-tung. 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 [M]. Hua-ling Nieh & Paul Engle (trans.). London: Wildwood House Ltd., 1972a.
- [2] Mao, Zedong. The Poems of Mao Zedong [M].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illis Barnston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b.
- [3] Mao, Tsetung. MAO TSETUNG POEM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 [4]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8.
- [5] 钱锺书. 谈艺录(补订重排本,上下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6] 钱锺书. 七缀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7] 许渊冲. 翻译的理论和实践[J]. 中国翻译, 1984(11): 5-10.
- [8] 许渊冲. 译学要敢为天下先[J]. 中国翻译, 1999(2): 4-9.
- [9] 许渊冲. 实践第一,理论第二[J]. 上海科技翻译, 2003(1): 2.
- [10] 许渊冲. 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 2012(4): 83-90, 127.
- [11] 许渊冲.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梦[J]. 中国外语, 2014(5): 1, 12-18.
- [12] 许渊冲.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 2016(5): 93-99.
- [13] 许渊冲. 钱锺书先生与我的信札掠影[J]. 档案春秋, 2017a(12): 30-35.
- [14] 许渊冲. 中国经典外译只能靠汉学家吗? [J]. 国际汉学, 2017b(3): 2, 5-9.
- [15] 许渊冲. 翻译中国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翻得好? [EB/OL]. 观察者, [2020-12-31]. <http://www.zgshigt.com/c/2016-05-31/1305219.shtml>.
- [16] 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17] 朱光潜. 诗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责任编辑:郭建辉